如导论所叙，有关中国内部持续性的“建制议程”（constitutional agenda）的三个问题是本书四篇文章的核心问题：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的协调；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；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。有论者以为此三者暗合政治学的基本问题：政治参与、政治竞争、政治控制，或可借此一窥作者的思路。依旧秉持着西方汉学家一般的从细处着手的方法，作者选取的主角分别是魏源、冯桂芬、税收的中介性势力在清朝的恶行事例与在共和国时期的消亡。

作者于本书中的长处，在《叫魂》中已展现的淋漓尽致，所占篇幅不长，所选事例不大，分析见解则富有洞见，译者说的“对于史、孔来说，不管从事何种研究，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‘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’”，大体得当。

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细节有许多方面，对于中国的现代性“转变”，尤其如此。在所谓“现代化”的过程中，作者所提出的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矛盾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概言之，这些至少不能道尽根本。在处理材料的取向上，作者的方法颇有可取之处，如关注除外部势力外的内部性历史演变，试图将历史的部分与更宏大的过程相联系。但或许是由于作者治学方法本身的局限，或者是作者所要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前人很好的研究基础，面对“中国现代国家起源”这一课题，作者所为自己所关注的方面赋予了并不恰当的权重，是为疏于对历史整体上的掌控。

作者在局部的处理和见解都有鞭辟入里、独创一格之处，这些都无可疑虑，单独拿出来都可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典范。唯其放到一起作为作者对大历史问题的关键洞见而提出时，则大有支离之感，所谓“散而无统，不足成一家之言”是也。

我们并不要否认作者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的重要性，却是以为应当作为“现代中国国家构建”的关键部分而不是核心来考虑。这样会在一个更进退余裕的位置。其实直到当下的中国，孔飞力的三大“建制议程”尚还是未有定论，有待于嗣轨之来者再创新篇，从实践上完成历史议题的建构，这就是体现作者的眼力所在了。